

拉丁美洲

游击战运动

〔英〕理查德·戈特著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理查德·戈特，1938年生于英国，曾在牛津大学读书，获得历史学的学位；1962年到1965年，在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1964年到1969年，曾担任美国《前卫报》主要撰稿人和记者，以及和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的研究员。本书就是在智利大学国际研究所写成的。

戈特在本书导言中，谈了古巴革命胜利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及古巴革命胜利后十年中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的基本情况。作者认为，这十年中，在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发生了比较重大的游击战运动，它们是：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本书写的就是这五个国家的游击战运动。《危地马拉的兵士和农民》一章，主要写了起义军的形成和斗争的情况。《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一章，主要讲委共和“左派革命运动”围绕着游击战运动的斗争情况。《哥伦比亚的暴力》一章主要写了亲古巴的民族解放军，并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卡米洛·托雷斯神父参加游击战运动的经过。《秘鲁的灾难》一章主要写的是“左派革命运动”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领导的游击战运动。《玻利维亚的悲剧》一章写的是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建立“游击中心”，进行游击战，最后被俘遭杀害的经过情形。在“结束语”中，作者列举了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失败的原因。

本书材料比较丰富，可供参考。作者自称本书是给德布雷所宣扬的“游击中心论”提供事实基础的，因此对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应注意予以批判。同时，书中多处攻击我国和拉美某些左派组织，

也应予批判。

本书附录十一篇，包括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游击队伍、游击阵线以及个别参加游击战的知名人士的宣言、决议、公报或纲领，可与正文参读。

本书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组织翻译，参加翻译、校对、加注的除本室的同志外，还有本校国际政治系、经济系部分同志及校外个别同志。由于译者、校者的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

1975.7

目 录

导言	1
第一部分 危地马拉的兵士和农民	39
一 阿本斯下台和游击队的起源	40
二 游击队开始行动了	53
三 容·索萨、托洛茨基分子与危地马拉“十一月十 三日革命运动”	62
四 图尔西奥斯·利马和起义军	79
五 选举与图尔西奥斯·利马之死	90
六 塞萨尔·蒙特斯与反共组织的滋长	101
七 各个游击运动的重新联合以及同共产党人的决 裂	110
八 美国充当的角色：大使之死与被放逐的教士	117
第二部分 委内瑞拉革命的失败	125
一 佩雷斯·希门尼斯的垮台	126
二 罗慕洛·贝坦科尔特的得势	134
三 游击战的开始	146
四 民族解放军	165
五 城市斗争：选举与选举之后	177
六 游击队员对共产党人	193
七 道格拉斯·布拉沃和卢文·佩特科夫的民族解 放军	210

八 共产党人对菲德尔	217
九 一个共产党人的结论?	225
第三部分 哥伦比亚的暴力	233
一 “暴力”时期及其遗产	234
二 共产党人和独立共和国	242
三 “工人学生农民运动”和“革命行动统一阵线”	252
四 马克塔利亚的陷落	259
五 民族解放军	269
六 卡米洛·托雷斯和教会	282
七 卡米洛·托雷斯和“统一阵线”	289
八 卡米洛·托雷斯和游击队	309
九 人民解放军	317
第四部分 秘鲁的灾难	321
一 秘鲁的背景	322
二 乌戈·布兰科和拉孔本西翁山谷	330
三 哈维尔·埃劳德在马尔多纳多港之死	347
四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和“左派革命运动”	353
五 “图帕克·阿马鲁”和吉列尔莫·洛瓦顿	370
六 “帕查库特克”和路易斯·德拉普恩特	386
七 埃克托尔·贝哈尔和“哈维尔·埃劳德”	393
八 共产党人和游击队	402
九 游击队的总结	412
第五部分 玻利维亚的悲剧	419
一 豪尔赫·马塞蒂和萨尔塔游击队	420
二 中苏分裂	424
三 拉巴斯的准备工作	431
四 尼阿卡瓦苏	442

五	新的“穆里略呼声”	448
六	背叛与行动	464
七	雷吉斯·德布雷	475
八	共产党人袖手旁观	481
九	华金的命运	489
十	切·格瓦拉的被俘与死亡	497
结束语: 是革命的失败吗?		506

附录

一	拉斯米纳斯山第一个宣言, 危地马拉, 1964 年 12 月	520
二	危地马拉劳动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议 (1965 年): “组织群众, 团结群众, 开展人 民革命战争”	525
三	起义军宣告脱离危地马拉劳动党的声明 1968 年 1 月(摘要)	532
四	“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纲领(1963 年)	537
五	哥伦比亚马克塔利亚游击队的土地纲领 (1964 年 7 月)	541
六	哥伦比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央报 告的一章(1966 年 1 月)	545
七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原则和纲领(1965 年 1 月)	548
八	卡米洛·托雷斯争取人民团结运动的纲领 哥伦比亚, 麦德林(1965 年 3 月)	552
九	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宣言: 人民解放军万岁 (1968 年 2 月)	558
十	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塞达在利马市圣马丁 广场的讲演(1964 年 2 月)	563

十一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原则的团结， 斗争的团结”，哈瓦那（1964 年 12 月）·····	581
大事记 ·····	585

导 言

在 1967 年 10 月 8 日,一个暖和的星期日夜晚八时半,我同一位英国朋友在玻利维亚东部的圣克鲁斯的中心广场一带散步的时候,有一个人从咖啡馆的桌旁向我们招手。

他说:“有新闻告诉你们。”我们说:“切·格瓦拉?”因为格瓦拉可能被俘的事我们已注意了一个星期。几天前,我们在巴列格兰德的小镇时,曾听到玻利维亚第八师师长华金·塞顿诺·安纳亚上校表示不用一星期就能把格瓦拉抓住的信心。上校说明了他的部队如何得到刚从圣克鲁斯北面由美国特种部队主办的训练营派来的六百名“突击队员”的增援。他还告诉我们:游击队是怎样被包围的,只有一面才有逃走的可能性,而即使在那边,军队也布置了乔装成农民的士兵,只要有游击队通过,就可迅速提供告急警报。从 9 月底游击队进入的一个村庄的居民们和被俘的两名游击队员所提供的证据来看,切无疑是这伙被围游击队的领袖。

那位咖啡馆里的联系人告诉我们:“切被俘了,但是由于伤势严重,可能过不了夜。其他的游击队员决死苦战,企图把他抢回去。政府军连长用无线电要求派一架直升飞机去,以便把他载走。”连长兴奋得很,他的讲话含糊不清。人们所能听到的只是:“我们抓到他了,我们抓到他了。”

我们的联系人,建议我们应该租一架直升飞机立即飞往游击区。此人不知格瓦拉的生死,但是他感到格瓦拉多半是活不了很久了。我们没有钱租用直升飞机,即使有一架的话。而且,无论如何,在玻利维亚决不可能夜航。因此,我们改租了一辆吉普车,

于10月9日星期一清晨四时出发，驶往巴列格兰德。

我们在五个半小时后到达那里，径直开到了机场。在那里，小镇的一半居民似乎在等待着，包括身穿白衣服的小学生，以及急于拍摄已死游击队员照片的业余摄影者们。因为，仅仅在两星期之前，玻利维亚游击队员科科·佩雷多和古巴的游击队员“米格尔”的尸体曾被运到这里。在机场附近的墓地里，埋葬着美丽的女游击队员塔妮亚的遗体。她和另外九名游击队员于8月31日在格兰德河中中了埋伏的奸计而阵亡。巴列格兰德的居民们，现在变得习惯于军队的来来往去了。

人群中最激动的要数孩子们了。他们指着天边，跳上跳下，因为孩子们较成人可以看得远些。转瞬间空中出现了一个黑点，很快就能看清它是一架直升飞机，在降落架上载着两名士兵的尸体。它们被解了下来，随便装上卡车，运到镇上去了。但是当人群散去时，我们暂留一下，把放在机场外围由巴西武装部队供应的一箱箱燃烧弹拍摄下来。我们借助于望远镜头，把一个身穿黄绿色军服但无军人标志的人拍了下来。经人证明，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名特务。

外国记者这样卤莽——因为我们是在事件发生后二十四小时内首先到达巴列格兰德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同几个玻利维亚军官在一起的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企图把我们逐出巴列格兰德。但我们有足够的证件表明我们确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并于几经力争之后，才允许我们留下来。那架唯一的直升飞机随即载了一位大人物塞顿诺上校再度飞往西南面大约三十公里外的战区。下午一时刚过，直升飞机又飞回来了，载回了一员得意扬扬的上校，忍不住露齿大笑。他宣布格瓦拉死了。他已经看到了尸体，毫无怀疑余地了。塞顿诺上校是个诚实人，除了绝对必要的外，他是不习惯于随便透露任何事情的。看来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我们赶到一家很小的电报局，把我们发向外界的报道，塞给一个惊奇和

怀疑的职员。对于所发的电报会不会到达目的地，我们都没有多少信心。

四小时以后，五时正，直升飞机再次飞回，这一次只有一具个子小的尸体绑在机外的降落架上。

但是，与前几次降落在我们站立的附近不同，直升飞机却在机场中央停了下来，停得远远的，使得好打听的新闻记者的眼睛瞧不到。我们被禁止越过由坚定的士兵们所组成的封锁线。但是，老远的那具尸体非常迅速地被装入一辆密闭的雪佛莱牌大篷货车后，车子便开足马力，急疾驶离了机场。我们马上跳上停在一旁的吉普车，大胆的司机驾车紧紧跟在货车后面。大约一公里之后，这辆雪佛莱车来了一个急转弯，在一所很小的医院的院子里停了下来。虽然士兵试图在我们通过之前关上大门，但因为我们跟得紧，使得他们不能那样做。

那辆雪佛莱开上了很陡的坡，然后倒车靠近一所墙头褪色的小屋，屋顶是竹头的，一头露天。我们跳下吉普车，趁货车后门尚未开启前跑到了那里。当货车后门终于开启时，中央情报局的那个特务跳下车来，不恰当地用英语叫嚷：“好吧，让我们把魔鬼卸在这里。”笨坯，他可不知道车门两旁各站了一名英国记者哩！

货车里面，一副担架上放着切·格瓦拉的尸体。从最初时刻起，我毫不怀疑这就是他。几乎整整四年以前，我在哈瓦那见过他一面，他是一个不易使人忘记的人。从那时起，我的个人记忆无疑同报纸上经常发表的他的照片混杂在一起了，但我必须承认：我已经忘记了他那稀稀落落的胡须的黑色了。他也显得比我记得的要瘦小些。在丛林中度过的岁月，显然使他的健康状况有所耗损。尽管我思想上有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毋庸置疑，这确是格瓦拉。当他们把尸体从车上取下来，放在平时作为洗衣作的小屋里的临时性的桌上时，我确实知道格瓦拉是死了。

胡须的式样、面孔的形状、多而飘垂的头发，准没有错。他穿

了黄绿色的军装和一件拉链茄克衫。脚上穿了褪色的绿短袜和一双显然是自制的南美鹿皮鞋。由于他全身穿得好好的，很难看出他伤在那里。在他的颈底有两个明显的弹孔，后来，当他们清洗尸体时，我看到腹上另一伤处。我不怀疑他的腿上和心脏附近有几个伤处，但我没有看到。

医生们正在探查他的颈部的伤处，我的最初反应是认为他们在寻找子弹，但是事实上他们只不过准备放进管子把防腐的福尔马林注射进去而已。其中有一名医生开始对这个已死的游击队员满布血迹的双手进行清洗工作。除了这些以外，尸体还没有别的使人恶心的地方。他看来异乎寻常地奕奕如生。他的眼睛睁开着，是明亮的；当他们把他的手臂从茄克衫中取出来时，他们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不相信他已死了许多钟点；那时候，我不相信他是在被俘后遭杀害的。我们都认为他大概在星期日凌晨因伤重缺乏医治而死的。

尸体周围的活人比死者更教人恶心：一个修女忍不住她的微笑，有时甚至大笑；军官们用贵重的照相机拍摄现场情景；当然少不了那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那个家伙似乎在指挥着整个活动，谁如果把照相机对着他所在的方向时，他就显出愤怒的样子。“你从哪里来的？”我们用英语问他，并且，开玩笑地补充问，“古巴？波多黎各？”但是他却并不觉得有趣，用英语粗率地回答说：“不从哪里来。”后来我们再问他，但是这一次他用西班牙语回答说：“你说什么？”并假装不懂似的。此人矮胖，三十四五岁，有一双凹陷的猪似的眼睛，头发稀少。很难说他是北美人还是古巴逃亡者，因为他讲英语和西班牙语同样流利，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口音。随后我发现他的名字叫做埃迪·冈萨雷斯，古巴革命之前，他曾是哈瓦那一个夜总会的老板。

早在格瓦拉死去以前，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在玻利维亚东南部产油城镇卡米里被俘和随后受审这一事件，

已经使活动在该国那一带的游击队的消息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对这一支游击队的了解，可能比对本大陆其他游击队的了解更清楚。但是，一般说来，虽然拉丁美洲通常被认为是一个革命的洲，人们对革命者的了解却是很少的。这些革命者在古巴革命的榜样鼓舞下，几乎十年来一直战斗在五、六个国家的深山丛林之中。

别处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了解得多一些。在亚洲的一些地方，自从日本最先从他们的岛国向外扩张以后，游击战争几乎变成一种连绵不断的现象。在非洲南部，占居多数的黑人反对白人压迫者的激烈的内部斗争，尚处在萌芽状态；但是未来斗争的样式，早已在战斗中勾划出来了。甚至在欧洲，在纳粹威胁下迫不得已的时候，连一些最不象会那样做的人也逃到山里去了。对外人铁蹄下或在本国傀儡统治下的暴政，实行武装反抗，是我们全世界人类遗产的一部分。

拉丁美洲也不例外。诚然，十九世纪击败西班牙帝国的，主要不是靠游击队。直至最近，国内的暴力行动，主要局限于传统的阶级冲突——枪击罢工者、农民和矿工，以及屠杀印第安人。与公认的看法相反，有计划的政治暴力行动，在拉丁美洲起着比较次要的作用。从欧洲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较之于美洲著称的经常发生的政变，牺牲了更多的生命。

然而，正如菲德尔·卡斯特罗于1960年在第一个《哈瓦那宣言》里所称的那样，“我们的美洲——博利瓦尔、伊达尔戈、胡亚雷斯、圣马丁、沃伊京斯、‘拔牙者’^①、苏克雷和马蒂期望取得自由的美洲”，已拥有不少革命英雄。而且，还限于十九世纪。墨西哥的萨帕塔和尼加拉瓜的桑地诺^②，保持了并加强了一种反抗的传

① “拔牙者”是巴西的爱国者（1748—1792），他的真实姓名是若泽·若阿金·达席尔瓦·沙维尔（José Joaquim da Silva Xavier）。——译者

② 关于桑地诺最新的书，是尼尔·麦考莱著的《桑地诺事件》，四角图书公司，美国芝加哥，1967年。

统，这种传统哺育了今天的革命者。卡斯特罗对这一传统作了下面一段描述：

真正的人民的声音：这种声音来自煤矿和锡矿的深处，来自它的工厂和制糖厂，来自它的遭受封建统治的土地。在那里，萨帕塔和桑地诺的后继者们里托人、丘洛人、高丘人、希瓦罗人拿起了自由的武器。这种声音在他们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他们的学生、妇女、孩子和他们的老人和无依者的心中共鸣着。

他的丰富的历史传统，被用这样出色的辞藻加以夸张之后，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无法与之比拟的。

根据约略估计，近二百年以来，全世界经历了五次真正的革命：法国、俄国、越南、中国和古巴。于是问题产生了，那些智力能够掌握深刻和重大变化的革命者们，在几次革命之间，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回答显然是，他们把时间用来组织革命，但是失败了。虽然这些革命失败了，但从革命中却产生了一部民间神话故事集，被用来哺育终将胜利的一种革命传统。

古巴革命成功以后，作为其后果之一，拉丁美洲经历了一个严重的反革命阶段，就象在第三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把古巴孤立并封锁之后，美国感到可以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为所欲为了。哪里有倾向于独立的政府出现，美国就赶到哪里，手持最为合适的斧子随时准备下手。美国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援助体系，它不仅训练了拉丁美洲的军人，还向他们的孩子推荐应该用些什么教科书——这样就有效地控制了大量识字的居民生活在内的文化环境。通过这一援助，美国对拉丁美洲进行了控制，其专制不亚于过去任何殖民强国对其属国的控制。在这种形势下，值得高兴的是，在有些国家里有些人造反了，即便他们所组织的革命多

半是失败了。

当我最初开始考虑写这本书的时候，关于这方面唯一的英文指引书是《新左派评论》^①中题为《拉丁美洲的长征》的文章，作者是那时还不知名的法国人雷吉斯·德布雷。从他所掌握的关于拉丁美洲各国革命运动的细致和第一手情况来看，德布雷似乎想写同我想写的相同的一本书——把极不充分的现有材料收集在一本书里，以便把拉丁美洲游击运动的性质、纲领、人物以及他们卷入进去的行动告知、启发更广大的与尚未有一定立场的读者。

然而，从德布雷在这方面所写、于1967年1月在哈瓦那出版的下一本重要著作《革命的革命？》来看，他意识到他的首要事业是一个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事业，把他的思想传播给革命同志们。他们当然会确切地知道他谈论些什么。德布雷认为毋需用不必要的历史材料来把那本书拉长。但是，正如在那本书的英文版在那年早些时候出版时，我为它写书评所说的那样：“我们对于拉丁美洲就是如此无知，英国人当中想知道德布雷借以建立他的理论的事实基础是什么从而能提出问题者屈指可数。”本书就是打算为帮助弥补那种无知而写的。

本书决不是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革命以后，在拉丁美洲崛起的一些游击运动而撰写的一本完整的或最终的历史著述。在现阶段，这样的任务可能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者力所能及的。那些往往只是用油印形式开始发行的文献资料还很难获得。重要的当事人往往死了，隐蔽起来了，或者还在山里难以见到。

但是，如果要由一个不可避免地由美国基金资助的大规模的考察组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不会成功的。拉丁美洲的左派，对于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极为怀疑，这种怀疑是很正当的。这种考察组的目的往往是政治性的，而不是纯粹学术性的。因此，谁要是为了调查游击战运动的事迹去拉丁美洲旅行而大事张扬的话，

^① 1965年10月至12月一期。

就立刻会在各紧要现场吃闭门羹的。即使一个留有胡须的英国激进分子，无疑地会碰上困难。玻利维亚前总统帕斯·埃斯登索罗博士有一次对我说：“我经常被告知要警惕留胡须的人。他们有一半是卡斯特罗分子，另一半是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①

然而，写书总得有个开端。正如 F. W. 迪金为他的关于意大利法西斯垮台的不朽著作所写序言中所说：

当代史的研究充满着诱惑和陷阱，诱使人们发表不成熟的个人判断和不加批判地堆砌过多的材料。尽管有着丰富程度不等的文字资料，但是许多材料在战祸中被毁了，也许更多的材料是由于重要的目击者的死亡而被埋葬了，或者给活人扣压了。尽管有这些困难（这是历史学家注定的命运），看来当代史学者的主要的、卑微的责任，是要在历史纪录烟消云散之前把基本纪事确定下来。^②

因此，本书只能说是一个英国观察者所提供的这方面主题的入门著述；这个主题吸引了拉丁美洲一大部分有政治觉悟的人们的兴趣，却使五角大楼与国务院的人员感到各式各样的头痛。这里收集到的情况出自各种来源，大部分来自不著名的左翼刊物中的文章，来自报纸，有时来自某些人们和书本。有三种西班牙文的刊物特别有用，值得一提的是：在蒙得维的亚出版的《前进》双周刊、在圣地亚哥出版的《最后一点钟报》双周刊以及在墨西哥城出版的《事件》杂志。^③ 这三本杂志除了总的说是亲古巴的并刊登一定数量的游击战运动的材料之外，以任何标准来衡量，它们都是非

① 由阿尼瓦尔·埃斯卡兰特领导的古巴共产党中的亲莫斯科派，用以反对德布雷的一项指控，是说德布雷不仅被法国共产党开除，而且是受雇于法国情报局的。

② F. W. 迪金：《粗暴的友谊》，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伦敦，1962年。

③ 《事件》杂志于1968年停刊。该刊编辑马里奥·梅嫩德斯·罗德里格斯创办了一本类似的新杂志，叫做《为什么？》。

常出色的刊物。《思想评论》从1967年创刊以来就证明是不能缺少的一种古巴杂志。

此外,任何拉丁美洲现状的外国研究者应当格外地感谢《世界报》和它的不疲倦的记者马塞尔·尼德尔冈。弗朗索瓦·马斯佩罗出版社的《轻骑》杂志也是十分有用的。在英语方面,除了刊登在《新左派评论》上的雷吉斯·德布雷著作的译文以及刊登在休伯曼和斯威齐所主编的《每月评论》上的和来自游击阵线的经常性的但有倾向性的文章而外,事实上再也没有什么了。《壁垒》杂志近来对于这方面开始产生了较为热切(虽然有些天真)的兴趣。

当卡斯特罗刚获得成功时,许多人相信拉丁美洲行将进入一个革命动乱时期。但自从约翰·肯尼迪就任总统以来,美国开始对考查社会动乱的原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正在设法对付游击战争的威胁。尽管人们广泛地相信革命已迫在眉睫,事实仍然是自从1959年以来,拉丁美洲只有五个国家产生了重大的游击战运动,这五个国家是: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

这些游击组织只有在前面三个国家里得以生存下去。1965年爆发的秘鲁游击战,尽管是周密策划的,在六个月之内就被粉碎了。1967年玻利维亚的历时不到一年的命运悲惨的“游击中心”,要不是切·格瓦拉和雷吉斯·德布雷亲临参加的话,那么全世界的报纸就不会把它当作一会事,正如在巴拉圭^①、厄瓜多尔^②和阿根廷^③那些相仿而未获成功的起义,没有受到人们注意一样。

我没有把上面三个国家的游击运动选入本书,部分是因为手头现成材料不充分,以致不可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另一部分是由于当它们还处于秘密行动的过程中时便都逐一被武装力量实际上扼杀了。我也略去了多米尼加共和国^④以城市基地为主的游击运动,以及巴西的农民联盟^⑤的内容,部分是为了限制本书的篇幅(两者,无论如何,都已经比本书涉及的一些运动得到更广泛的宣

传与研究);另外是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运动都不完全符合我的关于游击战运动的概念。根据我的狭隘的和比较沉闷的定义,游击战运动就是:一个政治组织,通过在农村的武装战争,来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结构;至于有关政治组织起而掌握最高权力的事,可以发生在这个目标达到之前、之后或正在达到的过程中。

切·格瓦拉在他的《游击战》一书中写道:“在现行的状况下,至少在拉丁美洲和几乎所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农村为战斗提供了理想的条件。”^⑥但这不是说所有农民运动一定要统统归属于游击起义一类。许多那样的农民运动——也许是大多数——在为什么而战斗的问题上,他们的视野是被严格地局限于他们的村庄、山谷或地区的。^⑦我对于乌戈·布兰科于1960年初在秘鲁拉孔本西

① 游击运动曾于1959年11月间,以后又在1962年初的短时间里在巴拉圭活跃一时。从亚松森通到同巴西交界处的斯特罗斯纳港的一条用碎石铺的道路,已经为日本移民们开辟了一块土地,那里过去是适宜于游击活动的地方。

② 1962年3月间厄瓜多尔学生组织的一次运动,得以在山区持续了两天。

③ 1959年12月间图库曼发生过一次游击运动,它是由乌图隆科司令官领导的持不同意见的底隆派分子所组成的。关于这个运动所知甚少。在1963—1964年,由司令官塞贡多领导的人民游击队(阿根廷)在萨尔塔区秘密地活动着。塞贡多(豪尔赫·马塞蒂)是格瓦拉的朋友。在塞贡多的组织里还有一个叫做帕比或里卡多的古巴人。此人是格瓦拉所率领的玻利维亚远征军的成员,于1967年7月被杀死。人民游击队(阿根廷)在行动之前就被消灭了。塞贡多的下落不明,被认为是死了。详见里卡多·罗霍著《我的朋友,切》,编者: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布宜诺斯艾利斯,1968年第175—193页。

④ 参看弗兰克林·J·弗朗哥:《多米尼加共和国、阶级、危机、指挥权》,《美洲之家》,哈瓦那,1966年。

⑤ 特别参看下列书刊:弗朗西斯科·儒里奥:《农民联盟是什么?》;安东尼奥·卡拉多:《伯南布哥州的干燥剂工业和“加黎利人”》,里约热内卢(巴西)1960年;霍苏埃·德卡斯特罗:《土地上的七棵棕榈树和一只大箱子》,圣保罗(巴西),1965年;欧文·路易斯·霍罗威茨:《巴西的革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与社会》,纽约,1964年,第13—34页;安东尼·利兹:《巴西与弗朗西斯科·儒里奥的神话》,载约瑟夫·梅尔与理查德·W·韦瑟黑德主编的《拉丁美洲变革的政治》,纽约,1964年第190—204页;贝诺·盖尔贾特:《巴西农村的阶级与拥护者》,《拉丁美洲》杂志,1964年7—9月号;《关于村社发展与农村社会研究的若干札记》,《拉丁美洲》杂志,1965年7—9月号。

⑥ 切·格瓦拉:《游击战》,古巴革命武装部,哈瓦那,1960年(?)

⑦ 参看格里特·休伊塞:《拉丁美洲农民的骚动》,国际劳工组织——“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研究拉丁美洲各国农民组织在土改过程所起作用的札记集。泛美农业开发委员会泛美联盟,华盛顿,1967年6月。